

论文集

辛亥革命在湖南

湖南史学会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论文集

辛亥革命在湖南

湖南史学会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1)
湖南人与辛亥革命	章开沅 (3)
辛亥革命在湖南	刘晴波 (16)
清末湖南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辛亥革命	傅志明 (33)
湖南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	贾维诚 (50)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会党的性质与作用	郭汉民 (63)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资产阶级立宪派	傅志明 (77)
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	汤志钧 (90)
试论自立军起义	刘泱泱 (104)
华兴会始末	姬春华 (125)
一九〇六年的萍浏醴大起义	漆 尘 (138)
一九一〇年长沙“抢米”风潮	彭祖珍 (151)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保路运动	林增平 石振刚 (168)
焦达峰陈作新与辛亥长沙光复	周学舜 (209)
辛亥湘军援鄂	黎 城 (233)
“二次革命”在湖南	鲜于浩 (249)

辛亥革命的杰出领导者黄兴·····	毛注青 (264)
试论黄兴·····	杨慎之 (280)
桃源渔父宋教仁·····	陈旭麓 何泽福 (299)
论蔡锷·····	谢本书 (320)
杰出的民主革命宣传家陈天华·····	林增平 (341)
杨毓麟与《新湖南》·····	陈珠培 (349)
禹之谟革命事略·····	成晓军 禹坚白 (360)
蒋翊武革命的一生·····	郭世佑 (377)
谭人凤传略·····	周秋光 (386)
革命家和诗人——宁调元·····	刘湘雅 (403)
辛亥革命前杨度的政治活动·····	杜迈之 (413)

前 言

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它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翻了帝国主义列强所支持的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建立了共和国，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获得空前的大解放，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因此，辛亥革命虽然最终失败，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在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省据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明清以来，湖南、湖北就属于一个行政区划，造成了两省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关系。辛亥革命运动中两省革命党人始终怀有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信念。内地最早的革命团体“华兴会”在长沙成立不久，就和在武昌继起的“科学补习所”相约同时发难。嗣后，在创建“同盟会”和“同盟会”组织的武装起义及其他革命活动中，湖南籍的革命志士曾经在全国各地、在多数场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一九一一年辛亥武昌首义的史册里，也纪录了众多湘省革命党人的勋绩。紧接着武昌首义之后，湖南率先响应，并迅即派遣湘军援鄂，有力地支持了湖北军政府和湖北人民的抗清战争，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无疑，在辛亥革命的编年史中，如果抹去了这期间在湖南所发生的有关事变和湖南籍革命家在全国的活动，就必不可能对这一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获得系统、全面的理解。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选录了论述辛亥革命时期有关湖南史事和人物的文章，编辑成书，旨在供读者阅览，俾可加深对祖国近代史，特别是辛亥革命史的了解；同时，也可供学术研究工作者置诸案头，结合披阅其他有关论著和资料，切磋取舍，把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引向深入。

经收录的文章计二十六篇。其中十五篇已在各地报刊上先后发表，这次收入本集，大都经作者重新校阅修订；十一篇则是未曾发表的新作。这些论文，观点不尽一致，我们在选编时，不作更改，概仍其旧，备读者琢磨比较；叙事重复处，只略作技术性的删节。就收录文章的内容看，有关政治事件、军事斗争、党派团体、人物评介等篇目显然较多，论述也较充分；而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思潮演变、学术文化等方面，则相对篇目较少，论述不足。这大体上正反映了关于湖南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现状，并非原于编辑者们选录时的偏爱偏废。至于辛亥前后湖南各府州县地方的事变和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斗争情况，则研究得还很不够；少许几篇涉及这方面的文章，如悉数收入，也欠全面，故暂付阙如。这些缺陷，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多加注意，逐步弥补。

参与本书编辑整理工作的有林增平、刘晴波、毛注青、刘泱泱、彭国兴。互推林增平主编。选录的篇目先经集体讨论决定，嗣即先后由毛注青、刘泱泱、林增平逐篇递相校阅编次，辑成一集。

本集选录、整理和编次，容有不当之处，敬希批评指教。

编者 1983年11月

湖南人与辛亥革命

章 开 沅

本书编者出这个题目，无非是要我说明湖南人民和进步人士对于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刚一握笔沉思，便想起一九〇三年六月刊登在《江苏》杂志第四期上署名为横江健鹤的《新中国传奇》楔子。

这是一篇虚构的政治小说，作者着意描述谭嗣同的鬼魂到上海“自由戏院”观看《新中国传奇》演出的感触。谭魂自称是“为民流血的第一人”，而唐才常在汉口就义是“第二次流血”。他不胜感慨地说：“幽明异路，今是昨非，自由革命的主义，究竟是万劫不磨的。老夫昔日理想幼稚，所以堕落魔障，生为保皇党魁，死作革命雄鬼。……寄语昔日保守（皇）党，一息尚存，难道必象咱们至死方悟么？”他甚至为革命思潮的勃兴而欢欣鼓舞：“哈哈，革命革命！自由自由！目下风潮又起，章枚叔、邹慰丹两同志，竟编成《革命军》一书，倡九世复仇之旨，策十年血战之勋。此唱彼和，风行沪上。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二君愿力诚非小可哩！”

鬼魂看戏的故事诚然荒诞离奇，但作者的本意则在于说明：崛起于十九世纪末年的爱国志士，经历了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义两次挫折，终于在血泊中惊醒过来。我不知道横江健鹤是何方人士，但他把谭嗣同、唐才常两位湖南豪杰之士，看作是戊戌、庚

子两次为建立新中国而流血牺牲的代表人物，则是颇有见地，而且已经为我现在写的这篇文章作了很好的铺垫。

十九世纪最后五年，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为发扬蹈厉的岁月。戊戌变法的功效，并不是政治体制的某些更新，而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前此三十年维新思潮的发展做了一个总结，并且由此而开始冲破了封建蒙昧主义的牢笼。在这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湖南地区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不仅表现在学会、学堂的设立之多仅次于沿海的江苏和直隶，而且还表现在新旧之争呈现出更为激烈的形式。南学会俨然以地方议会自居，时务学堂造就了一代革新和革命的先驱者，而《湘报》和《湘学报》则在长江流域有力地推进了维新事业的进展。当年活跃在历史舞台的一批湖南先进人士中，谭嗣同和唐才常属于维新运动的左翼，而且影响遍及全国。他们不仅以“冲决网罗”的勇敢呼号，唤醒了中国第一代的革命民主派；而且还以自己的壮烈牺牲，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开辟了道路。

过去有的论者，往往单纯从革新方式的不同着眼，把辛亥革命与戊戌变法以至自立军起义截然对立起来。其实，从戊戌开始，中经庚子，直到辛亥，这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一个完整过程，也是中国走向近代化历史运动的一串明显序列。如果只强调湖南人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而看不到它与湖南人在戊戌、庚子两次革新运动之间的渊源关系，那就未免是数典忘祖。在这里，不妨借用当年湖南革命志士自己的话，来说明湖南进步人士和广大人民逐步觉醒并奋起反抗的历史进程：“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真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若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

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圻，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纂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己。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故吾湖南人之奴性，虽经十一朝之栽培浸灌，宜若可以根深而固蒂矣，然至于今日，几几乎迸裂爆散，有冲决网罗之势。庚子之役，唐、林、李、蔡之属，诛锄酷烈，萌芽殆尽矣，而今岁乃复有贺金声一事。……夫以雄城巨镇、拥旄仗节者之所不能为，而唐、林、李、蔡以徒手为之；唐、林、李、蔡殒身灰骨曾不几日，而贺金声复以徒手而继之。”^①

现在可以言归正传，因为这位作者既然说到自立军失败和贺金声起事，那么便已经把探索的目光伸展到《新中国传奇》作者所谓“第三次流血”——辛亥革命的范围了。

应该说，湖南人民和进步人士在辛亥革命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曾建立过不可磨灭的历史勋绩。早在一九一二年三月，孙中山即曾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给陈天华、杨笃生、杨卓林、郑子瑜等湖南死难烈士以极高的评价。他在给陆军部的命令中说：“按民国缔造之功，匪一手足之烈，睹兹灿烂之国徽，尽系淋漓之血迹。以上诸烈士，或谋未遂而身赴西市，或难未发而瘐死圜圉，或奋铁弹之一击，或举义旗于万夫，或声嘶去国之吟，或身继蹈海之烈。……尚有陈烈士天华，前后屡图义举，均未获就，发愤著书，凡数十万言，皆发扬民族之精义，至今家有其书。此次义师一呼，万方响应，实由民族学说灌输人心，已匪朝夕，故铜山崩而洛钟应，光复大业，期月告成。”^②这几乎已经为辛亥革命中所有湖南志士的反抗活动绘制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① 湖南之湖南人(杨毓麟)，《新湖南》第二篇“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

② 《大总统令陆军部准予建立杨、郑二烈士专祠并附祀吴、熊、杨、陈四烈士文》，南京《临时政府公报》民国元年三月六日。

为孙中山所着重强调,作为革命先导的“民族学说灌输人心”,人们往往只津津乐道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这两篇作品确实是由作者的心血凝铸而成,“一字一泪,沁人心脾,谈复仇而色变,歌爱国而声嘶”^①,广泛地激发了城乡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爱国思想。然而,我却想在这里强调一下一九〇三年在日本出版的杨笃生《新湖南》的思想内容。此书虽然以地区命题,并且以“湖南之湖南人”作为著者署名,但却并非仅仅着眼于省区的自治自立,也不是单纯以文字风格的浓郁乡情扣人心弦。我认为,它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从一开始便以广阔的视野探索了二十世纪的时代特征。作者对帝国主义这个怪物的认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先进的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理解,尽管他的某些具体观点未必一一精当。杨笃生把“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放在民族运动的整体中来剖析,同时又把振兴中华的事业放在新世纪的世界全局中来考察,因而便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高出侪辈的思想深度。

当然,从事“民族学说灌输人心”工作而又取得显著成效的,并不仅仅是陈天华和杨笃生。人们可以看到,在一九〇三年前后,有一批思想新颖、才华出众的湖南青年,努力从事新思潮的传播工作。由黄兴、杨笃生、樊锥、梁焕彝等在日本创办的《游学译编》杂志,以及稍后由黄兴、蔡锷、杨笃生、张孝准、魏肇文、许直等创办的湖南编译社,在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潮方面,它们堪与主要是由江浙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并驾齐驱。以《游学译编》为例,栏目有学术、教育、军事、实业、理财、内政、外交、历史、地理、时论、新闻、小说等十二

^① 《祭陈星台先生文》,《民报》第2号。

类，内容相当丰富。发表于该刊第十期的《民族主义之教育》一文，明确指出中国唯一的出路是革命：“权衡今日支那民族时势之轻重，事业之缓急，莫如革命。革命者，今日支那民族最大之幸福也，民族主义则求此最大幸福之线引也。”这种激越的战斗呼号，与《苏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报刊的革命言论互相应和，吹响了一九〇三年中国知识界新觉醒的时代号角。此外，还不能不提到赵必振在一九〇二年和一九〇三年先后翻译出版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幸德秋水著）、《社会改良论》（岛井满都夫著）、《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这些都是中国早期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较有影响的译著，尽管它们并不完全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过去有的论者，在论述辛亥以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如何传入中国时，往往把目光仅仅集注于久享盛名的严复。其实，二十世纪初年这一大批进步留日学生的译著，如果从总体的工作量来看，则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较诸严复这位启蒙大师都有所前进。特别是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对于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学说的传播，以及对于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介绍，都已经把严复远远地抛在后面了。而这些方面的宣传理论工作，以后又为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所发扬光大。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正是在接受《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基础上创办的。陈天华、宋教仁等湖南志士，都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

湖南志士大多具有实干精神。章士钊在《刘霖生（揆一）先生七十寿序》一文中曾经说过：“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我想，这种特性，大约也就是鲁迅用以评论黄兴的所谓“楚人的反抗的蛮性”吧！因此，在一九〇三年以后，我们不难发现这

些湖南志士在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更多的坚毅性格和首创精神。

黄兴等人不仅在东京积极参加“拒俄”运动，投身义勇队、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而且以“运动员”的身份率先回国策动反清革命。由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周震鳞等发起组织的华兴会，是国内最早成立的革命小团体，而且它的影响并不限于湖南。由于湖南和湖北是关系最为紧密的邻省，加上黄兴、宋教仁等又曾就读于武昌的两湖书院和文普通学堂，所以华兴会的活动对于湖北科学补习所的成立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随后策划的长沙起义也是预定两个团体协同动作的。前此在1905年春夏之间连续刊登在《湖北学生界》（旋易名《汉声》）上的“大湖南北同盟会”广告，似乎早已预示着这种省际革命联合行动的出现，并且成为各个地方性团体相结合以组成全国性革命政党的先声。

华兴会和湖南进步留日学生在建立同盟会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已经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事实。具体说来，他们的作用包括三方面。

首先是从组织上和骨干上为同盟会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根据同盟会会员初期（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两年）名册，在已登记的979名会员当中，湖南籍者为158人，占总数的16%强，仅次于广东籍会员人数。这158名湖南籍会员，加上125名湖北籍会员，大多与华兴会、《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且很自然地把黄兴、宋教仁等看作自己在政治上的带头人。同时还应该看到，湖南籍会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政治上相当活跃。在同盟会章程起草员八人当中，即有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湖南人士，并且显然处于主导地位。在同盟会东京本部领导机构中，黄兴首先主持执行部庶务工作，实际上相当于副总理，其后以庶务干事主持本部工作者则以刘揆一为最久；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

亦曾一度代理庶务干事，虽非湖南籍但却曾加入华兴会的张继任司法部判事，并且是《民报》最初的发行人；胡瑛、陈家鼎、覃振等任评议部评议员，其他任同盟会各部职员者还有一些华兴会或《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的非湖南籍人士，他们大多追随黄、宋或至少与黄、宋志同道合。

其次是较早地确认和拥戴了孙中山对于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一九〇〇年惠州起义以前，孙中山主要是依靠南方会党和海外华侨策动武装起义，在国内（特别是知识界）并没有很大影响。惠州起义失败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带头与他交游的留日学生是长沙秦力山。正如章太炎所说的那样：“孙公之在东国，羽翮未具，力山独先与游。自尔群士辐凑，岁逾百人，同盟会之立，斯实为维首焉。”^①另外一位长沙人士章士钊，则出于对孙中山领袖素质与品格的尊崇，将宫崎滔天所写的《三十三年之梦》加以节译，以《孙逸仙》书名出版。译者自序把孙逸仙称作“近今谈革命者之始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认为“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从康、梁营垒分化出来的秦力山也为此书作序，赞誉孙中山：“举国熙熙皞皞，醉生梦死，彼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这些宣传介绍工作，为同盟会领导体制的形成，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舆论准备。所以一九〇五年七月，孙中山一到东京，中国留日学生便奔走相告，欣喜莫名；孙、黄一席谈话，便赢得黄兴的衷心爱戴，终身追随，而陈天华甚至称孙为“世界之大人物”。八月十三日在富士见楼举行热烈欢迎孙中山的大会，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八月二十日在灵南坂举行的同盟会正式成立会议，到会者一致选举孙中

① 《秦力山传》，《太炎文录》续篇。

山为总理，并且顺利通过了孙中山倡导的革命纲领。所有这一切，犹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说明孙中山在革命民主派中的领袖地位，已经经历多次斗争实践的考验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确认。从内地知识界来说，湖南先进人士最早也最为努力地发现和宣传孙中山的革命领导作用，这应该被看作是湖南人的贡献与光荣。

第三是在同盟会最为困难的时期坚持和发展了会务工作。一九〇七年以后，同盟会由于经费分配问题和某些政见分歧，内部争端愈演愈烈，几至使本部工作濒于瘫痪。黄兴始终维护革命团结，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他恳挚地劝说东京会员以大局为重：“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①他还义正词严地驳斥了陶成章等人对孙中山的诬蔑与攻讦，表现出革命党人的坦荡胸襟与坚定立场。年轻的刘揆一以庶务干事名义主持东京本部工作，他不顾章太炎等人的反孙怒火，也不顾刘师培伙同若干日本人企图攘夺同盟会领导机构的猖狂活动，始终如一地拥护孙中山的领导，捍卫革命阵营的团结。他在极其艰难的困境中坚持本部工作，甚至遭到张继的公然殴辱，也不向反孙的潮流屈服。如果没有黄兴、刘揆一等多数党人的坚守宗旨、主持正义，同盟会这面革命旗帜在一九〇七年以后未尝没有消失的可能。在湖南籍同盟会员中，宋教仁、谭人凤等虽曾参与过反孙活动，但他们的错误是有限度的。从主流和全局来说，宋教仁和谭人凤始终没有自外于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部同盟会的建立，诚然有某些不团结的因素混迹其间，但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即弥补了同盟会本部主要领导人片面注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

意经营华南的缺点，以全力推动关系全国局势的长江中下游革命运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们仍然是高举同盟会的旗帜，以首创主动的精神努力使同盟会的领导作用赶上内地革命形势迅速前进的步伐。

我想再谈谈湖南志士和湖南人民在武装起义和革命战争中的重要贡献，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或奋铁弹之一击，或举义旗于万夫”之类壮举。

对于以黄兴为杰出代表的湖南志士，在同盟会领导的历次起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对湘军的演说中已经有过定评。他说：“湖南老革命党，最著名的有黄克强，他有一次自安南入钦廉起义，当时到钦廉来抵抗革命党的清兵，有两万多人，黄克强带的革命军不过两百人，所有的武器不过两百枝枪，用那样少的人，和那样多的清兵打两个多月仗，到后来弹尽而援不至，还可安全退出。照这一次战事说，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象这样的战斗，是非常的战斗，不可以常理论。象这件不可以常理论的事，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①如果说，辛亥革命时期那一代爱国志士，就是用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把清王朝推翻的，那么黄兴则堪称当时的典范。所以黄兴死后，章太炎赠送的挽联是：“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这可以说是章氏捐弃派系成见后所作的公正评价。

在这里，我想着重回顾一下湖南人民群众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

首先是震惊中外的一九〇六年的萍浏醴起义，充分体现出湖南人民蓄之已久的反抗与首创精神。这一带的煤矿工人、陶瓷工

① 《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2页。

人、贫苦农民以及会党和变兵，“不数日聚众数万人，占聚三四县，声势之大，为历次义师所未有。”^①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武装斗争，湖南人民以“自动之义师”（孙中山语）揭开了此后革命党人一系列武装斗争的序幕，并且贡献出以刘道一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儿女。“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②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于南京临时政府创立伊始的这首挽诗，不仅是对烈士个人的深情怀念，而且也是对所有萍浏醴死难烈士和湖南人民的充分肯定。

其次是一九一〇年的长沙抢米风潮。这场斗争不仅在规模和激烈程度方面为同年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各省的抢米事件之冠，而且由于爆发于长沙这样的省会要地，其影响便更为深远。长沙抢米风潮和“相继而起”的湘阴、宁乡、益阳、岳州、衡州、澧州、浏阳、平江、湘潭、醴陵、沅江等地的各种饥民反抗斗争，与湖北沔阳、武穴、崇阳等地的饥民暴动汇成一片，形成强大的冲击力量，有力地震撼着清朝政府在华中地区的统治。用当时一个日本领事的话来说，这是“整个清朝前所未见的紊乱”^③。它显然促进了全国革命危机的成熟，并且直接为第二年十月两湖地区的起义提供了必要的群众基础。

第三是湖南的保路风潮在全国保路运动中的带头作用。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严格意义的收回路权斗争是以粤汉铁路为发端。由鄂、湘、粤三省留日学生组织的“鄂、湘、粤铁路联合会”，

①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第60页。

② 《革命先烈传记》，中国文化服务社1942年版，第265页。

③ 村山（长沙）密电第10号，转引自周饒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61页。

可以说是全国最先建立和影响较大的争路团体；而一九〇五年粤汉线在反美爱国运动中赎回分省筹款自建的利权，则可以说是保路运动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并且有力地鼓舞了其他地区保路斗争的蓬勃展开。一九〇九年夏天，为反对清朝政府以向外国银团借款方式重新拍卖路权，长江流域中上游保路运动再次勃兴并且迅速进入高潮。湖南留日学生出版的《湘路警钟》杂志（后改名《湘路危言》），本地各界人士组织的“湘路集股会”和《湘路新志》月刊，又在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到一九一一年春季，湖南已经出现“通省人士，奔走呼号”，“舆情激昂，万众一致”的民怨沸腾形势。五月中旬以后，不仅长沙各界群众万人集会，而且还有修筑株洲到长沙一段铁路的一万多工人进城示威，并且号召罢市、罢课、抗租税，^①这样就把保路运动推进到一个更为深入的新阶段。湖南保路运动虽然始终未能发展到四川那么大而持久的声势，但直接引起辛亥革命的这场大火，首先却是在湖南点燃的。所以，《满清野史》的作者说：“自铁路收归国有，湘人率先反对”^②，这自然是历史的定评。

到辛亥这一年，几乎在海内外各地都可以看到三湘健儿的踪影。不仅有黄兴等人在广州孤军奋战、血染襟袍，而且有蒋翊武、刘复基等在武汉运筹帷幄、首举义旗。武昌起义胜利以后，又是焦达峰等在湖南率先响应发难，随即是湘军大批援鄂，以湘鄂互为犄角之势，最先堵截了清军的猖狂进逼，有效地协助稳定了曾经一度成为全国革命中心的湖北军政府。黄兴亲自领导武汉保卫战，临危不惧，血战经月，吸引了大批清军主力，为其他各省独立赢得了时间或创造了条件。汉口、汉阳的相继失守，虽然不无

① 见于《清政府邮政总局档案》。

② 《满清野史·铁路国有案》，第18页。